

# 傅若金诗歌理论探析

吴致宁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傅若金是元代著名诗人,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他受传统的“性情说”影响而提出“诗本性情”,注重诗歌的抒情特质;受当时诗坛复古风气的影响也提倡诗歌复古,但是又具有一定的通达性;继承传统的诗教观,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带有儒家的功利色彩。此外,他还从地域的差异来认识诗歌风格的不同。

**关键词:**元代;傅若金;诗歌理论;性情;复古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5-0063-05

傅若金(1303—1342),字与砺,一字汝砺,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曾受学于“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梈的门下,深受范梈诗法的影响。至顺二年(1331)游京师,名声大噪,顺帝时,随使出访安南,归来后授广州路儒学教授。至正二年(1342)暴疾而卒,年四十。有诗文集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王世祯《居易录》称“其(傅若金)歌行得老杜一鳞片甲,七律亦有格调”<sup>[1]446</sup>。

傅若金的诗歌理论受当时批评风气的影响,有着与当时文坛批评风气相一致的地方,同时也有自己对于诗歌独到的见解。他的诗歌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诗本性情、复古倾向、诗教观。此外还涉及到关于不同地域对于诗歌风格形成影响的研究。

## 一、诗本性情

以性情论诗由来已久,《诗大序》中即有“吟咏情性”<sup>[2]15</sup>之说,由于《诗经》在我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吟咏情性”的意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演变为“性情说”,成为诗歌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sup>[3]99</sup>,强调诗歌抒发情感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和“为情而造文”<sup>[4]286</sup>,都强调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性情说”在唐、宋也都影响深远且有所发展,注重创作主体情感的抒发。

元代文人诗论中多有以性情论诗者,但其中又都有所侧重。刘将孙认为“诗本出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sup>[5]151</sup>,强调诗人情感的真实和自然;杨维桢说“人各有情性,则人人有诗”<sup>[6]240</sup>,强调主体性情的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的诗文风格,其中包含有张扬个性的意味;吴澄作为理学宗师,认为“诗以道情性之真”,又提出“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智、仁四端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sup>[7]46</sup>,强调用仁、义、礼、智对“情”加以约束,带有鲜明的儒家功利色彩。

傅若金的诗歌理论中亦多有涉及“性情说”的言论,他在《欧阳斯立诗序》中说“诗本性情为词者

收稿日期:2016-05-03

作者简介:吴致宁(1991-),男,河北馆陶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

也”<sup>[8]271</sup>，又在《赠魏仲章论诗序》中说“诗之道本诸人情”<sup>[8]285</sup>，强调诗歌的本质和功用是为情而服务。将诗歌的产生与人情联系在一起源于由《诗大序》而发展演变的“性情说”，《诗大序》中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sup>[2]6</sup>，所谓“言”则可以理解为诗歌与文章，正是强调主体内心情感的变化发而为诗歌文章。傅若金所言“诗本性情为词者也”和“诗之道本诸人情”正与《诗大序》中的观点相一致。在强调诗歌抒情特质的同时，傅若金又进一步强调诗歌的“情本位”，他说：“故夫善言诗者，不徒以其词而以其本。所本正矣，词或未工，不害其为词。本失其正，词虽工，何益哉？”<sup>[8]285</sup> 所谓“本”，无疑就是傅若金所提倡的情，此处所强调的就是诗歌的抒情本质，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对于诗歌的重要作用，诗歌的文辞反而显得不再重要。但是，傅若金此论并非要废弃言辞，内容和形式是组成诗歌的两个重要的方面，缺一不可，只是在他看来，诗歌文辞的华丽或质实都应该围绕诗歌内容进行，文辞的工与不工都不应该以牺牲诗歌内容为代价，诗歌中所包含的创作主体的情感应该是第一位的，不能“为文而造情”。由此出发，傅若金强调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在《南征稿序》中说：“凡所以感于心、郁于情、宣于声而成诗歌者，积百余篇。”<sup>[8]268</sup> 心中有所感，发而为诗，正是强调诗歌要表达创作主体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评论《诗经》的一些篇目中也说，“古之《皇华》遣使，《杕杜》劳还，《采薇》歌戍役之苦，《黍离》闵宗周之旧，斯皆原情所生，而诗由作也”<sup>[8]268</sup>，都是强调诗歌抒发创作主体情感的真实与自然。

诗歌有古今之分别，那么人的性情呢？傅若金在《欧阳斯立诗序》中说：“余尝恨今之诗不复古矣，而其人性情岂异哉？”<sup>[8]271</sup> 所以诗歌虽然分古今，但是古今人的性情其实是相同的，他又引用《孟子》中的“今之乐犹古之乐”<sup>[8]271</sup>，进一步佐证其性情无异的观点。正是因为古今之人的性情无异，那么他由此便有了“今之诗亦犹古之诗”<sup>[8]271</sup> 的观点，虽然傅若金的诗歌理论中存在复古的倾向，而且在他看来今人之诗与古人之诗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但是从古今性情无异以及“今之诗亦犹古之诗”的观点来看，他并不是将古诗摆在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是认为今人通过一定的努力，其作品亦可达到古之诗的水平。

既然性情为诗歌之本，而且古今的性情无异，那么用性情这一标准来衡量古今诗的优劣则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他在评论从《诗经》以来的诗歌发展史时认为：“魏晋以降，则世衰而诗亦随之……词浮靡而气卑弱。”<sup>[9]232</sup> 但是他称道陶渊明，说：“其间独陶渊明诗，淡泊渊永、复出流俗，盖其性情然也。”<sup>[9]232</sup> 将陶渊明的性情与其诗联系在一起，并探寻其诗高于时人的原因是“性情然也”。

中国诗歌的发展从上古歌谣到《诗经》、楚辞，再到汉魏诗歌，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和发展，从而在唐朝达到了诗歌发展的高峰，而宋人面对唐诗这一高峰又另辟蹊径，找到了一条与唐诗相异的发展道路。到了元代，诗歌依然在发展，但是，面对前人在诗歌发展中所达到的高度，元代诗人应如何寻求一条适合本朝诗歌的发展路径，无疑是他们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梳理中国诗歌发展史并试图寻求诗歌发展的新路径时，元代文人通常将前代诗歌放在一起有所比较，尤其热衷于对唐诗和宋诗优劣的比较。有元一代，论诗者多有标举唐诗而贬抑宋诗的倾向，持此种观点的论者多是针对宋末诗歌的弊端而发，反对宋人以“义理”入诗，批判江西诗派末流的雕镂过甚和江湖诗派的摇笔即来、过分俗化，推崇唐诗之“性情”。唐宋诗之争成为有元一代论诗者长久不衰的话题。对于唐诗主性情、宋诗主议论，傅若金亦有所认识，他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sup>[9]235</sup> 但是是否主性情的唐诗就比主议论的宋诗要优秀很多呢？在之后的议论中傅若金给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说：“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之也。”<sup>[9]235</sup> 唐诗达性情，宋诗立议论，这并非是傅若金的创见，但是将唐宋诗的这种区别与《诗经》中的国风相联系，则是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他不以这种区别来作为区分唐宋诗优劣的标准，显示出对于唐宋诗的优劣之争的通达态度。

此外，傅若金关于性情的观点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他在提出“诗本性情为词者也”和“诗之道本诸人情”之后又说“古之圣人以成政教”<sup>[8]271</sup>、“止乎礼义”<sup>[8]285</sup>，这种观点则带有鲜明的儒家功利色彩，

而与理学宗师吴澄所谓的以仁、义、礼、智对“情”加以约束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

## 二、复古倾向

在元代诗文批评领域,复古的风气可谓是贯穿有元一代始终,而这种复古风气的形成则是与对宋代诗歌的反思密切相关的。宋代诗人面对唐诗所达到的高度另辟蹊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和苏轼等人都积极寻求宋诗的发展道路,而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则成了宋诗风格的代表。然而,江西诗派的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几乎在江西派形成的同时,对江西派诗风的反省或批评也就产生了。北宋叶梦得著《石林诗话》,南宋初张戒著《岁寒堂诗话》,均对之作了尖锐的批评”<sup>[10]818</sup>。而元代复古风气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对于江西诗派末流和江湖诗派弊端的批评之上。傅若金对于唐诗和宋诗,并不以性情和义理来判断其优劣,但是,他对于宋诗还是有所批评的,他说:“诗至南渡末而弊尤甚焉,高者刻削务持太过;卑者模仿掇拾为奇;深者钩玄撮怪,至不可鲜;浅者杜撰张皇,有若俳优。”<sup>[9]236</sup>很明显,傅若金对于宋诗的批评也正是针对宋末诗坛的弊端而发。

元代复古风气的形成,也与元代反对雕饰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元代,反对诗歌中的雕饰之风似乎成为了元代论诗者的共识,甘复《赠陈氏子序》中说,“世无文章久矣,藻饰以耀其能,刻镂以矜其工,原之以道一无至焉者,文章果以戏设乎哉”<sup>[11]270</sup>,批评雕饰的弊端。张翥《安雅堂集原序》中说:“文章至季世,其敝甚矣。元兴以来,光岳之气既浑,变雕琢磔裂之习而反诸醇古,故其制作完然一代之雄盛,文人学士直视史汉魏晋以下盖不论也。”<sup>[12]583</sup>他对于元代诗歌成就的评价虽然有待商榷,但是其对于诗歌文章雕饰之风的反对则是显而易见的。由反对诗歌的雕饰之风进而提倡一种简古的诗歌风格,从而导向诗歌复古的道路上来。

既然要复古,那么对于诗歌复古的取法对象上自然要有所选择。元代论诗者中推崇唐诗而贬抑宋诗的倾向,导致他们在复古取法对象的选择上自然会越过宋诗,而取法唐诗以至溯至《诗经》《离骚》以及汉魏古诗。甘复《涂子东游稿序》中说:“本之六经,参以孟、韩,取于庄、骚,而成一家之言。”<sup>[11]264</sup>可见其取法对象之广,并不是拘泥于某家某体而言。

傅若金的诗歌理论中也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在《欧阳斯立诗序》中说:“余尝恨今之诗不复古矣。”<sup>[8]271</sup>痛惜古诗之不存。又在《邓林樵唱序》中说:“自《骚》《雅》降,而古诗之音远矣。”<sup>[8]270</sup>很显然,他将《诗经》《离骚》作为古诗的标准,认为后代的诗歌和古诗之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而对于古诗不存的哀悼必然包含着其对于古诗的向往。他在《王安民管斑集序》中说:“文将彬乎典诰,诗将披乎风雅。”<sup>[8]274</sup>可见,他所谓的复古就是要让诗歌复归风雅。而他所谓的“自《国风》不作,而古诗之道熄矣”<sup>[8]305</sup>、“自《骚》《雅》降,而古诗之音远矣”<sup>[8]270</sup>,无疑就是将《诗经》《离骚》作为古诗的标准,而成为复古最重要的取法对象。

既然提倡复古,那么对于如何复古,傅若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评价友人诗文时,他说:“积学为文,有志于古之作者。”<sup>[8]274</sup>既然要达到古诗的高度,必然要在内心认同古诗,并且以其为学习的标准。傅若金所提出的复古的道路并非都是抽象的标准,而是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如“捐去金人粗厉之气,一变宋末衰陋之习,力追古作,以鸣太平之盛”<sup>[8]285</sup>,除去“鸣太平之盛”这一不太可能实现的作者的主观愿望之外,傅若金明确提出要作古诗,一定要摒弃金朝和宋末诗歌的陋习。他又提出“五言诗莫尚乎汉魏”<sup>[8]305</sup>,将汉魏五言诗作为五言诗的高峰,从而提供了又一个可以取法的对象。

在傅若金看来,“学”对于复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也一再强调“学”的重要性。他称赞友人“积学为文”“好学有才识”<sup>[8]268</sup>,都着重于强调“学”的重要性。此外,他还以农夫耕田来比喻文人“为学”,他说“士人之学,其犹农夫之耕乎?善耕者,不以岁不获而弃其鋤耨;善学者,不以时不见信而徙其业。农而弃鋤耨,不可以为生;士而徙业,不可以为学。”<sup>[8]269</sup>强调“为学”应该坚持到底而不能半途而废。至于所学的内容则包含很广,“本之以六经,贯之以百家。出入韦、柳之门,步趋韩、欧之径”<sup>[8]274</sup>;“暇日即读书

为文不废,凡志、记、叙、述、铭、赞、赋、颂之作,各极其体,汲汲焉古作者之度,惟恐其不合”<sup>[8]268</sup>。通过广泛的学习各家学说、各类文体,融会贯通,之后再加以创作则会接近于其心目中的古诗。从傅若金复古的取法对象以及学习对象中可以发现,他主张广泛学习、博采众取,可见其对于诗歌理解的通达性。而由于傅若金虽然认为诗有古今之分,但是人之性情则古今无异,并且把人之性情作为诗之本,所以在他看来,今之诗也可以达到古诗的高度,给有志于古诗者以希望。

### 三、诗教观

《诗大序》中说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sup>[2]10</sup>,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后世对其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诗歌理论中影响深远的诗教观。

傅若金强调性情对于诗歌的重要作用,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同时,他对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也有所继承,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他说“其(欧阳斯立)诗皆本诸民彝,切乎时政,未尝无为为之”<sup>[8]271</sup>、“古之圣人以(诗)成政教”,正是强调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作用。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认为诗风的转变与世道的盛衰存在一定的联系,正如《诗大序》中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sup>[2]8</sup>强调了诗风和世道盛衰的内在联系。傅若金论诗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吾闻湘江之滨,楚放臣屈子之所游,其文辞之被兹土者,山巅水涯之居人,必有得其遗音者矣。然屈辞多悲愤邑郁之声,而舜裳所谓樵唱者不类乎是。”<sup>[8]270</sup>同为湘江之滨,屈原所作之词章带有“悲愤邑郁之声”,而傅若金对友人诗文的评价则与屈原词章的风格有异,他将这种区别归结于“盛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世殊事异,屈原身处楚国灭亡之际,所以其辞多“悲愤邑郁之声”,而傅若金的友人则不然,所以说世道的盛衰与诗人诗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是傅若金对于传统儒家诗教观的继承。

和诗教观相联系的是文与道的关系,对于文与道之关系的探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较早,在先秦时代的《荀子》中即有对于文、道关系的讨论,在其后的各个朝代都有涉及文、道关系的言论,文与道之关系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荀子之后的扬雄、刘勰对于荀子关于文与道之关系的观点有所继承,并且对道的含义有所发展。简而言之,荀子和扬雄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谓的道,更多的是立足于对儒家道统的宣扬,而刘勰对于道的理解则较为通达,突破了儒家道统的束缚而对自然之道有所重视。到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韩愈、柳宗元等人极力倡导以文明道,而其对于道的理解亦较为广泛,“道德”“古文之道”等都包含其中。到了宋代,在理学盛行的影响下,对于文与道之关系的理解多陷入较为狭隘的境地。在元代,文人对于文、道关系的言论亦有很多,甘复在《与伯寔先生书》中说:“六经之文,皆所以明道。道以文著,文以道传。得古人之道,然后能为古人之文。古人之文,非执笔而为之也。道充于心,见之于言,不自己也。”<sup>[1]1251</sup>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注意到文、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文的目的在于“明道”,而道亦因文章而显明。

傅若金在《邹云章利市卷子后序》中说:“夫六经、诸史、百家之文,圣贤君子以载道述事而垂世不朽者也。”<sup>[8]288</sup>其中对于道的理解并没有拘泥于儒家道统的束缚,而侧重于将道作为文章内容来理解,所谓“垂世不朽”则又带有鲜明的儒家功利色彩。在评论友人诗文时,他说:“故自管而窥豹,犹因文以明道”<sup>[8]274</sup>,同样没有将道限定于儒家道统的范围内。从傅若金对于儒家诗教观的接受来看,他对于文、道关系的理解本应该更侧重于儒家道统的宣扬,但是,他却能突破儒家道统的束缚,而将道置于更广泛的范围中来理解,则可看出他的诗歌理论的通达性。

此外,傅若金的诗歌理论中还有对于不同地域诗歌风格差异的理解。他说:“夫南北之气异,文亦如之。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简重而不浮,其失也俚。”<sup>[8]268</sup>南北地域的差异带来南北文风的差异,并指出南北方作者的特点和得失。“荆楚之邦,地大而物蕃,其镇衡岳,群山宗焉;其浸洞庭,众水潏焉;其人屈原、宋玉、贾谊之流,百世慕其风焉。观于是者,问学宜识其所谓会归,而文辞多忠义之气,施诸世用,盖将一日不忘乎君者也”<sup>[8]290</sup>。影响一个地域诗文风格形成的因素,既包括该地域的自

然环境,同时更重要的还包括该地域的人文环境、历史沿袭等。荆楚之地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屈原、宋玉和贾谊等历史人物的影响,才会形成该地域的文辞多忠义之气的风格。虽然说从地域的差异来考察诗文风格差异形成的原因并非傅若金的创见,但是他的诗歌理论中能注意到这一点,则可说明他对于诗歌理解的着眼点是很广泛的。

综观傅若金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本性情,注重诗歌的抒情特质,是对性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受元代复古风气的影响,他也以古诗为目标,提倡复古,只是在复古的取法对象上较为通达,而不仅限于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上;而对于传统诗教观的接受上,显示出傅若金诗歌理论中较为鲜明的儒家功利色彩。傅若金的诗歌理论在元代诗歌批评史上既有其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对于元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永 溶,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陆 机.文赋集释[M].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4]刘 勰.文心雕龙今译[M].周振甫,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 [5]李修生.全元文:第20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6]李修生.全元文:第41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7]李修生.全元文:第15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8]李修生.全元文:第49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9]傅若金.诗法正论[M]//蔡镇楚.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10]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1]李修生.全元文:第60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12]李修生.全元文:第48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Research on Fu Ruojin's Poetry Theory

Wu Zhin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Fu Ruojin is a famous poet in the Yuan Dynasty, he also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etry theory. He agreed with traditional "disposition theory" and advocated "poem's nature is disposition", paid attention to the lyr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poetry atmosphere also advocated poetry retro, but also had certain accessibility; H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poetry teaching view,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 which had the utilitarian color of Confucianism. Besides, he also understood the different style of poetry from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Fu Ruojin; poetry theory; disposition; retro

(责任编辑 王 作)